

古代劳动人民的 反孔斗争

(讨论稿)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一九七四年九月

目 录

一、柳下跖起义反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

摧毁奴隶制的统治基础.....（ 3 ）

二、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反对“克己复礼”，

粉碎奴隶制复辟逆流.....（ 5 ）

三、冲破“天命论”，向君权宣战.....（ 9 ）

四、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伦理观念.....（ 12 ）

五、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历史经验.....（ 23 ）

古代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在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时，要把毛主席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以把握住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充分认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上的伟大动力作用，充分肯定劳动人民在反孔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和反孔斗争，影响和推动了儒法斗争。劳动人民在历史上始终是反孔斗争的革命先锋和主力军。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不仅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还进行残酷的思想统治。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德意志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就是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和反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在前一个时期是为维护和复辟反动的奴隶制服务的，是与争取解放的广大奴隶为敌的；汉元帝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又为维护反动的封建制服务，一直与想挣脱封建压迫的广大农民阶级相敌对的。奴隶阶级和农民

阶级从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亲身经历中早已认识到孔孟之道是压迫之道，复辟倒退之道，反动之道。他们骂孔老二是罪大恶极的“盗丘”，斥儒经为乱世害民的“妖书”。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九期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因此，奴隶阶级要推翻奴隶制，农民阶级要推翻封建政权，在革命过程中总是首先把矛头指向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无情的批判。奴隶社会柳下跖起义是如此，封建社会从陈胜、吴广到明末的李自成起义都是如此。劳动人民英勇不屈的反孔斗争，是他们反对腐朽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中表现。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古为今用”（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第六期社论）我们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必须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以更好地从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和儒法斗争中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把历史的经验同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好地结全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古代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有数百次之多，他们的反孔斗争我们不能按时间顺序来一一的讲，这里只讲五个问题。

一、柳下跖起义反对孔老二的 “克己复礼”，摧毁奴隶 制的统治基础

春秋末期，正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大变动时期，充满着尖锐、激烈的革命同反革命、奴隶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奴隶不断暴动和起义，推动了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总的形势是“天下大乱”，奴隶制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

“礼”是孔老二给反动的腐朽的奴隶制身上穿的一层神圣外衣。“克己复礼”是他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孔老二是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劳动人民要反对奴隶制，就必须反孔，剥去孔老二“礼”的外衣，揭露奴隶制的反动本质。正如恩格斯所说：“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因此，春秋末期奴隶纷纷反对孔老二，无情揭露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荷蓀人骂孔老二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一个守门人斥孔老二是不识时务的顽固派（“知其不可而为之”）；长沮、桀溺嘲笑孔老二是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小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其中批判得最有力的是柳下跖的反孔斗争。

跖，姓展，家住柳下（今山东西部一个地方），人们称他为柳下跖。跖是一位英勇善战，具有深谋远虑的奴隶阶级武装起义的杰出领袖，奴隶阶级的伟大思想家，反孔的英

雄。跖所领导的起义队伍“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起义队伍，声势浩大，锐不可挡，猛烈冲击着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孔老二这个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政客，当然对此刻骨仇恨，骂跖不守王法，“为天下害”，他决心亲自出马，配合奴隶主的暴力镇压，以“克己复礼”的反动说教，妄图要跖不要“犯上作乱”，以“造大城数百里”，“尊将军为诸侯”作诱饵，以“共祭祖先”为幌子，要跖放下武器，充当奴隶主的顺民。跖对孔老二这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视为仇敌，一听他要见，将他拒之门外，不屑一见，但孔老二出于他的反革命阴谋硬厚着脸皮要见。跖一见孔老火冒三丈，手按宝剑，“横眉冷对千夫指”，当面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无情批判。孔老二开始大谈所谓“文武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奴隶制，还把商汤，文王、周公等大奴隶主头子吹捧为德高望重的“圣人”，要跖法先王，保存奴隶制。跖针对孔老二的反动说教，一一痛加驳斥，指出孔老二美化的奴隶制，是“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人压迫人的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奴隶阶级要争取“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的基本人权，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理想社会；斥责孔老二吹捧的所谓“圣人”是“乱人之徒”，他们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乃甚可羞！”揭露孔老二是“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的反动政客，是个“好面誉人”，“亦好背而毁之”的“巧伪人”（两面派）。柳下跖还痛斥了孔老二的“孝悌”等反动说教，并对勇、义、智、仁作了奴隶阶级的全新解释。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进攻时冲锋在前谓

“勇”，撤退时沉着在后谓“义”，分析形势时善于正确判断谓“智”，分战利品时公平合理谓“仁”（“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柳下跖给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孔老二作了一个很好的结论“盗莫大于子，”称他为罪大恶极的“盗丘”。最后柳下跖斩钉截铁地说：孔老二，你所说的那一套，都是我们所坚决鄙弃的，不要再罗嗦了，立刻滚蛋（“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即去走归，无复言之。”）。孔老二被跖驳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面无人色，上车时双手发抖，缰绳三落，狼狈而逃！柳下跖的反孔革命思想和战斗精神，为劳动人民和进步的法家所称颂，法家代表人物荀况称颂柳下跖，说他“声明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而那些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和反动派都诬蔑跖，攻击跖，但无损于跖的光辉思想的一根毫毛。柳下跖的英名已经永远铭记在劳动人民的心坎中，流芳百世。

柳下跖同孔老二的这场论战，是以孔老二的复礼阴谋彻底破产，跖反“复礼”的革命精神完全胜利而告终。这场论战，是奴隶同奴隶主阶级、革命同反革命、反复礼同复礼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正面交锋。柳下跖痛斥孔老二的事实深刻说明：孔孟之道，“克己复礼”是劳动人民的死敌，劳动人民是反孔斗争的革命先锋。正是由于奴隶们的英勇斗争，才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的统治基础，推动了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

二、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反对

“克己复礼”，粉碎奴隶

制复辟逆流

秦始皇坚决执行了法家政治路线，镇压了奴隶制复辟势

力，统一了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但是复辟奴隶制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秦始皇死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乘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政变后，赵高立刻用儒家的反动的复辟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进步的革命路线，妄图复辟奴隶制。赵高改变了秦始皇的保护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策，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反动政策，“大赦罪人”，安插亲信，复立六国，把被打倒的没落奴隶主阶级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在赋税和徭役方面，也采取了倒行逆施的措施，“厚赋天下”，“收太半之赋”（赋税额高达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二），“戍徭无已”，“复作阿房宫”，企图使农民重新沦为奴隶，大大加重了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因此，就在赵高篡权后九个月，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7月陈胜、吴广在安徽蕲县（今宿县）大泽乡上空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烽火，向反动的奴隶制复辟势力和反动的孔孟之道开战。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也是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反孔斗争。陈胜（河南登封人）、吴广（河南太康人）和其它九百名贫苦农民，被强迫征调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县）去服兵役，他们走到安徽蕲县大泽乡遇暴雨，道路冲毁，无法按期赶到。而按秦的法律规定，误期是要杀头的。在这种情况下，陈胜、吴广挺身而出，号召阶级兄弟与其送死，不如起来造反，杀了押送他们的都尉，大家拥立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揭竿而起。陈胜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这是农民阶级的革命造反宣言，是批判孔老二不准“犯上作乱”的战斗檄文。陈胜的造反宣言，实质上批判了孔老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

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君权神授”的反动说教，打击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不可逾越的统治秩序，冲破了帝王将相神圣不可侵犯的森严等级，粉碎了孔老二所宣扬的那一套永恒不变的“君君、臣臣”的精神枷锁。在陈胜的革命口号鼓舞下，起义队伍迅速发展。由关东六国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也参加了起义的革命洪流。

随着秦末农民起义的迅猛发展，潜伏在各地的复辟派（包括六国的贵族，反动儒生和孔老二的后代）也蠢蠢欲动，怀着复辟的阴谋，打起反秦的旗号，混入革命队伍，企图改变农民起义的路线。当陈胜在陈县（淮阳）准备建立农民政权时，旧贵族张耳、陈余就跳出来反对，攻击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革命行动是“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提出要陈胜重立六国之后的复辟主张，并威胁说，不“兴灭继绝”，而自立为王，是私心的表露，起义就要瓦解，气焰十分嚣张。在这样的紧要关头，陈胜断然绝拒了这个反动主张，毅然建立革命政权——“张楚”，称了楚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陈胜称王以后，孔老二的八代孙孔鲋又跳出来主张复辟，公开要陈胜“法先王”，胡说：

“昔周代殷，乃以兴灭继绝为首政”，要陈胜效法，就是说现在应该把六国国君的后代立为王。陈胜当场义正严词批驳，说：“六国国君的后代我们不能分封，过去先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自己起来造反的，从来不是周朝的臣民，为什么要向先王学习呢？”在这场反复辟和复辟斗争面前，充分表现了农民起义领袖反对“克己复礼”，反对复辟的革命精神。但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以后孔鲋、张耳、陈余之流还继续利用孔孟之道，多次破坏分裂革命队伍。

在陈胜的号召和带动下，各郡县的农民纷纷举起“张楚”的大旗，积极投入了反秦的革命斗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项羽在吴（江苏吴县）、刘邦在沛（江苏沛县）的起义。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扫除了六国奴隶主复辟势力，地主阶级也第一次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势力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这表明，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反复辟的主力军，只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当时反复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遭到劳动人民起义领袖的坚决批驳，复辟奴隶制的罪恶阴谋，在劳动人民起义的冲击下，已遭到可耻的彻底破产。可是，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这个当代中国罪大恶极的“盗丘”，乞于孔老二的亡灵，又以“克己复礼”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搞“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和他的先师孔老二、赵高、张耳、陈余之流一样，遭到彻底破产，而且失败得更惨，拆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历史事实证明：一切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搞复辟倒退的好汉们，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只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复辟、倒退一定失败，反复辟，坚持革命必然胜利，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三、冲破“天命论”、向君权宣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渐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到西汉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政权已经巩固，奴隶制复辟的主要威胁已经过去，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逐渐激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转化为反动派。他们由尊法反儒逐渐转化为尊儒反法，加强了对农民的残酷统治。董仲舒的反动理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根据孔孟之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思想，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的反动理论，标榜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是替天行事的，孔孟儒学是代天讲话的“圣经”，都是万世不易、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为封建统治的永远性制造理论根据，不准人民起来造反。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矛盾论》）在汉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都把董仲舒的反动理论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在汉以后的农民起义军，特别是黄巾、黄巢起义以冲天的革命气概，冲破“天命论”，向君权宣战。

1.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军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的“天”

东汉末年，豪强大地主交替使用暴力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悲惨景象。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农民纷纷起义反对地主阶级政权。当时流传着“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的歌谣，这充分表达了农民敢于起来造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是东汉末年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由河北巨鹿（今平乡县）人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军以黄巾裹头为标记，号称黄巾军），由于经过长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动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流地区的八个州数十万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发展迅猛异常，“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黄巾起义军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响亮革命口号。苍天，象征地主阶级的政权；黄天，指农民阶级自己的政权。这个战斗口号从政治上表现了黄巾军决心推翻东汉反动政权，建立农民自己政权的雄心壮志，从哲学上看，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要“变”的思想，是进步的思想，是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就是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这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的有力批判。这个战斗口号，鼓舞广大农民群众，去冲破孔孟之道的精神牢笼，在推翻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军坚持了二十三年，人数发展到几十万，席卷了长江以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黄巾军到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地主庄园，没收不义之财，矛头直指东汉王朝的封建政权，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

2.唐末黄巢大起义，以冲天的革命气慨，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民政权

唐末，公元 875 年，在河南山东交界地区爆发的黄巢大起义，提出了“冲天”的革命口号，黄巢自称“冲天平均大将军。”被压迫人民不畏天命，不怕“天怒”和“天诛”，向儒家的“天命论”宣战，直接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政权，农民革命要“自予问罪”唐天子。这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潮流革命精神。“冲天”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群众敢于藐视貌似强大的地主阶级国家机器，决心要打垮地主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黄巢的“冲天诗”——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金甲，本是菊花的一种名字，这里象征农民革命武装）这就是最好的写照。这首诗是农民起义的雄壮革命战歌，它鲜明地表达了农民革命要以武器去批判吃人的旧世界，以革命力量去战胜反革命力量，农民军要冲进长安，捉拿唐天子，摧毁长安的地主阶级政权，建立被压迫阶级的天下。这首豪迈的战歌，以冲天为主题，造了儒家“君权神授”的反。农民革命使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天也变来地也变，

“敢教日月换新天”。黄巢大起义，转战南北，纵横十余省，行程数万里，奋战十年整，在长安建立了“大齐”农民政权（公元880年12月13日）。这样大规模的进军，不仅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创举，而且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黄巢起义军在长期的战斗中，歼灭了大量唐朝军队，杀了大量官吏豪绅，正所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

公卿骨。”革命专政是何等威风。黄巢起义打得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从而有力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黄巢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证明，劳动人民不仅有“冲天”的革命气概，而且有“冲天”的革命本领；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的创造者。

孔老二的“天命论”，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作维护世袭等级特权地位和剥削制度的思想武器，奉为至宝。历代劳动人民以“冲天”的革命气概，用无数革命实践批驳了“天命论”，使“天命论”一次又一次宣告破产。可是今天，林贼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又把“天命论”这个破旗打出来，把自己标榜为“授命于天”的“超人”，“独往独来的天马，”疯狂鼓吹“天才论”，其罪恶目的，也和历代的反动派一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永远统治劳动人民，建立林家世袭的法西斯王朝，当苏修的儿皇帝。结果他成为“罪大恶极”的叛徒卖国贼，一堆粪土。这就是历史对他的无情宣判，也是“天命论”必然破产的又一铁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信天命，只信革命，永远是历史的主人，那些自命为是“授命于天”的所谓“超人”、“超天才”，都一个一个的在“天命论”的喧嚣声中掉进了历史的垃圾坑里，遗臭万年。“天命论”不但永远救不了他们的命，只会把他们葬入坟墓。

四、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宗

法伦理观念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

全没有土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进入后期阶段。宋时一小撮大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到明末，全国的土地高度在皇室、宦官、大地主的手里，而大量的农民则无立锥之地，一贫如洗，贫富问题、土地问题更加尖锐和突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人民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竭力加强思想统治。孔学为一切剥削阶级制造了压迫有理的谬理。地主阶级宣扬“尊卑有序，贵贱有别”，“三纲五常”，用极端反动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伦理观念，来为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提供理论，来麻醉农民思想，使其俯首听命，任人宰割。宋代程朱理学适应反动派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统治人民的官方哲学。理学继承和发扬了反动的“天命论”，把“天”、“神”称为“理”（或“天理”）。它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看成是“小大有定”，“等差有别”，是“天理如此”。还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不准人民起来造反。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宋代以后，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冲击没落的黑暗的封建反动统治，用革命的手段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伦理观念，向反动理学维护的不平等制度宣战。

1. 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均贫富”口号

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反封建、反孔学的战斗口号。起义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公元993—995年），队伍发展至数十万人，占领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数十个州县，给北宋统治集团以极大的震撼。

王小波于公元993年3月发动起义时向群众宣布：“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意思是说：我痛恨穷的穷，富的富，太不公平，我们要起来造反，使贫富平均。劳动人民根本不相信人的贫富是由天来决定的，而认为是人为的，可以改变的。王小波提出反映农民群众利益的“均贫富”口号后，立即获得广大人民的响应，于是“贫者附之益众”，“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初步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并占据了青城县的县城。

同年夏天，农民军在王小波领导下，以破竹之势攻占据有战略意义的彭山县、全歼守敌，当众杀掉贪官酷吏齐元振县令，人心大快。在愤怒的群众要求下，将齐元振“剖其腹，实以钱”示众，给以应得的革命惩罚。接着把齐元振昔日搜刮来的财产，“散其金帛”，归还人民。同年12月，王小波乘胜率领起义军猛攻彭山县以北的江原（今崇庆县境），一举攻克。不幸的是，王小波在这次激烈的战斗里中了敌人的暗箭，不久因伤重而牺牲了。王小波的英勇牺牲给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民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起义军拥推李顺为领袖继续战斗，连克永康军（在今灌县境内）、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城邑，包围了重镇成都。公元994年3月，李顺领导起义军攻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称“大蜀”王。同时又指挥起义军四出夺取附远的城邑，四川广大地区都在农民军的控制之下。当时起义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并且捣毁了地主豪绅武装盘据的庙宇，把“圣人”“先哲”，神仙鬼怪，通通打翻在地。起义军在成都烧毁孔庙，把绘在孔庙的“仲尼四科十哲象”（孔老二的十个著名徒弟）等也一并“烧毁略尽”。起义军的反孔斗争，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

情，对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起着巨大的作用。

李顺领导的“大蜀”政权开始实施“均贫富”的政策。李顺在自己被推举为领袖之初，即召集各乡里“富人大姓”“令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自己家人吃的）足用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各地起义军在李顺领导下，根据“均贫富”的革命纲领，风起云涌地没收地主的“财货”和“财帛”分给贫苦人民。地主官僚则拼命抗拒阻挠，他们将“财货埋藏地窖，然后仓惶逃跑。这里可见起义军是何等的威风！而孔孟儒家之徒，仇视这些革命措施，诬蔑起义军领袖为“寇”，为“大盗”，攻击起义军的革命行动为“劫掠”和“剽劫”。但都无损于起义军的一根毫毛，只能暴露历代孔孟之徒，都是剥削阶级所豢养的走狗。

公元994年5月，宋兵攻成都，破城时，十多万起义军大部分壮烈牺牲。李顺随僧人逃出，藏于民间。后李顺不幸在广东被当地地方官逮捕，处死。起义军撤出成都后，由部下张余领导的一支起义军先后攻克嘉（乐山）、戎（宜宾）、泸、渝、涪（涪陵）、忠（忠县）、万（万县）、开（开县）等八州，兵锋曾到达夔州（奉节）和施州（湖北恩施）。湖北江陵也有数千漕卒响应。公元995年2月，张余在乐山被捕、殉难。以后零星的起义军还持续了两三年之久。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提出“均贫富”这样响亮的口号并付诸革命的实践，鼓舞着农民不屈不挠地斗争，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打乱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同维护建封等级与纲常的唯心主义理学根本对立。这对于批判反动的儒家思想，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孔孟之道的要害。

王小波、李顺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事迹和“均贫富”的